

葛红兵 著  
温潘亚

# 文学史 形态学

WENXUESHI XINGTAIXUE



上海大学出版社

WENXUESHI XINGTAIXUE

# 文学史 形态学

葛红兵 著  
温潘亚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史形态学/葛红兵,温潘亚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2

ISBN 7-81058-271-2

I. 文... II. ①葛...②温... III. 文学史-形态学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76 号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常熟市印刷八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84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23.00 元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到  
该基金资助，特致谢意。**

# 序 言

许 总

红兵和潘亚的新著《文学史形态学》终于问世了,我既为他们的学术有成而衷心高兴,也为与他们的文字之交结出更大的果实而欣幸不已。大约四五年前,我在审读稿件时,不经意地读到红兵的一篇来稿,题目是《文学史本体论反思》,这类选题在当时文学史观念问题正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的情况下,本来并不足为奇,但当我深入读下去以后,便立即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文学史本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体分析了文学史认识的特殊性、方法论及价值学问题,他认为,文学史观与一般史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相比于一般历史,历时性并不是文学史的最重要属性,文学的历史并不抽象地存在于共性(合目的性)之中,抽干历史具体性的历史共性的真实性应该受到质疑。他进而认为,文学史的历时性如果仅仅被理解为合目的性、合规律性,那么必然要以抽干历史的具体性、偶然性为代价。全文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显然出自青年学子之手,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乃至论证上,文章不免有稍嫌稚嫩之处,但其表现出的睿智却是十分难得的,特别是对古典哲学思维方式下的文学史研究的批判,真正体现了思维方式的当代化特征。当我与他取得联系后,才知道他们正在扬州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不久,这篇文章得以在由我负责的《江海学刊》文学版面内发表出来。

其后,我们通信颇多。红兵在来信中,经常谈到他对文学史的理解以及对文学史学建构的一些设想,同时也谈到他的想法不被人理解的苦恼,还说到由我编发的论文发表后,产生较好的反响,使他坚定了对这一课题继续深入下去的信心。他说的这最后一点,当然是我感到最为欣慰的。此后,我又连续编发了他的四五篇论文。其中有《论文学史时间结构》,在该文中,他将文学史时间从自然时间中剥离开来,被定

义为包括“黑洞时代——星河时代”、“暂时时间——永恒时间”、“现实时间——审美时间”等一系列由宏观到微观、由现象到本质的不同层次的矛盾对立面的取代消长、互融互渗的复杂结构体,显示了他在建构文学史自身时序结构方面的建设性思考;另有一篇是《论“文学史规律”》,在该文中,他认为支撑当今文学史学认识体系的一个最重要概念“文学史规律”是一个混乱而模糊的概念,它从经典哲学衍化而来,带着许多未经反思的朴素的文学史信仰,而实际上“文学史规律”作为来源于对遗留态文学史进行归纳整理而得到的一种主观认识,离开了它的原生时空就立即失效,它不能提供指导,也不能提供预言,它是一个具体的概括性陈述,不能被用于另一语境的分析性陈述,因而也不能提供另一时空关系中的任何判断,这无疑在将文学史规律与自然规律彻底分离的基础上对文学史本质的认识更进一层。自此以后,他的文学史学研究已是一发而不可收,在国内许多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我和温潘亚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他和葛红兵的年纪相仿,又同处于苏北,是地道的老乡,他们合作让人高兴。

就文学史研究领域而言,新时期以来固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在量的表现上还是在质的层次上都明白无误地标志着这一学科本身所达到的空前的繁荣与高度,然而,文学史学的建构毕竟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旧学与新知的击撞更为这一过程留下许多需要深入思考并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随着思想桎梏的打破与西方当代各种哲学美学思潮的涌入,中国人经历了又一次人性复苏与文学自觉,这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突出表现为对“生活——艺术”这一社会反映论观念与视角的强烈不满,并不约而同地将着眼点集中于审美主体,在“文学是入学”这一理论基点上,大力张扬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被当作人的灵魂学、性格学、精神主体学,甚至是心灵创造性的自由表现,文学史也就自然被界定为人类的心灵史。显然,文学史视点由客体到主体的转移,在特定的层面上深化了对文学史本质的认识,但它实际上又从另一方面游离了文学本体,文学消融于入学也就失去了文学自身。就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与倡扬,表现为对认识主体主导作用的强调,认为文学的实际历史“是不能把握的”,“文学的存在在历史的原生态这一

层次上是零碎的、片断的,文学发展的系列(史)是因人而异的”,因此,研究、编写文学史的意义在于“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以当代意识重构中国文学史注重的则是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其根本目的“主要是借助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文学观、审美观”,极为明显,这种以主体性为原则、以当代意识为基点的文学史观,在强化研究主体创造性与个性化的同时,往往容易导入以偏概全、随心所欲的误区,其表现形态固与“文革”前那种机械反映论截然不同,但在从特定角度与需要有意或无意地改变或无视文学史本相的意义上却恰恰走入同一轨辙。再比如,针对机械反映论将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和附庸的简单化方法,重视文学自身的构成因素及其发展演进规律的探讨,表现为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对于文学史发展动因与演进规律的讨论,在不断趋于深入的同时也不断出现新的歧异,一时很难取得一致共识,但就这类探讨的总体思路而言,却显见一个共同之点,即力图以逻辑推演为规律建构的基点与形式,将一系列概念、范畴作为文学史演进的支撑点,整个文学史也就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然而,文学史既非政治的社会的观念史,也非哲学的思想的乃至文学自身的思想观念史,从本源的意义上说,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其生成离不开特定的个体的作家;这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与个性的艺术创造带有更多的偶然性与突发性,从形式的意义上说,文学作为由个体创造的语言艺术与意象结构,也显见丰富性与生动性。因此,将文学史现象全然纳入严密的逻辑结构,以逻辑思维的“三段式”原理推衍文学史进程,甚至以几个大“圆圈”划出整个文学史规律,实际上割舍了大量的生动的文学史现象,有重新陷入另一种简单化误区之嫌。正如黑格尔把历史的发展都视为理念的外化,将哲学的理性的观念甚或一般的文化哲学观念直接用来概括文学史现象及其规律,也难免有悖于文学史丰富、生动而独特之本相。实在地说,我虽然也曾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甚至还出版过两部断代文学史——《唐诗史》、《宋诗史》,但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仍是心存困惑的。

我觉得,红兵和潘亚的文学史形态学研究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些令人困惑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努力,我不敢说他们已经解决了这

些问题,但至少可以说他们将这些问题的认识作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前些年,通过零星的几篇论文,对他们的文学史学研究已有大致的了解,现在,读了《文学史形态学》一书全稿,更感到他们在这问题上思维的缜密与全面。全书篇幅虽然并不为多,但却体现了对文学史学的全方位思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史以及文学史形态的基础理论,讨论文学史形态观;二是文学史形态论,讨论文学史存在形态以及各形态之间的关系等;三是文学史模式论。全书体例亦颇具匠心,由“文学史形态观反思”开始,结束于对新的“文学史形态”的呼唤,既显示出对旧有文学史模式的强烈的批判意识,更可见对新的文学史形态的渴望与热情。

中国传统史学有史才、史学、史识之说,也就是说,必须才学识兼具,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想,建构文学史学也是如此,我与红兵、潘亚经常谈到这一话题。也就是说,在文学史学科建设中,理论的建构与创造当然是最终的目标与追求,但这必须建立在对文学史文献材料充分占有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理论才具有广泛的涵盖力与经久的生命力。愿与红兵、潘亚共勉之。

丁丑

新秋白露日序于金陵抱一轩

责任编辑：陈翔燕

责任校对：张 懿

技术编辑：冯谷兰

封面设计：  谷夫平面设计工作室

#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第一章 文学史与文学史形态    | 1   |
| 第一节 文学史          | 2   |
| 第二节 文学史形态        | 9   |
| 第二章 文学史形态观反思     | 29  |
| 第一节 传统文学史形态的史观问题 | 29  |
| 第二节 反映论文学史形态观反思  | 38  |
| 第三节 进化论文学史形态观反思  | 46  |
| 第四节 人本主义文学史形态观反思 | 53  |
| 第三章 文学史模式论之一     | 66  |
| 第一节 刘勰的文学史思想     | 69  |
| 第二节 鲁迅的文学史理论     | 84  |
| 第四章 文学史模式论之二     | 97  |
| 第一节 丹纳的文学史理论     | 97  |
| 第二节 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理论   | 108 |
| 第三节 卢卡契的文学史思想    | 119 |
| 第四节 社会批评的文学史模式   | 131 |
| 第五章 文学史模式论之三     | 146 |
| 第一节 形式主义的文学史模式   | 146 |
| 第二节 新批评的文学史模式    | 160 |
| 第三节 结构主义的文学史模式   | 178 |
| 第六章 文学史模式论之四     | 194 |
| 第一节 接受美学的文学史模式   | 194 |
| 第二节 范式理论与文学史建设   | 210 |

|                               |     |
|-------------------------------|-----|
| 第七章 文学史模式论之五·····             | 227 |
| 第一节 社会中心模式·····               | 227 |
| 第二节 读者中心模式·····               | 233 |
| 第三节 作者中心模式·····               | 238 |
| 第四节 文本中心模式·····               | 246 |
| 第五节 “模式论”的限度·····             | 254 |
| 第八章 文学史的时空形态·····             | 260 |
| 第一节 文学史时间形态·····              | 260 |
| 第二节 文学史空间形态·····              | 269 |
| 第九章 文学史家·····                 | 279 |
| 第一节 历史与现实之间·····              | 279 |
| 第二节 诗人与学者之间·····              | 284 |
| 第三节 彼岸关怀与现世热情之间·····          | 288 |
| 结语：还只有一个“真实”能救我们·····         | 293 |
| 参考书目·····                     | 299 |
| 附录：批判 参与 开放——葛红兵文学史学研究述评····· | 303 |
| 后记·····                       | 311 |

## 第一章

# 文学史与文学史形态

文学史作为一个概念,其外延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客观存在的文学发展过程,它由具体的文学活动构成,如作者的创作、作品的产生与流传、读者的阅读等。二是以文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为基础撰写出来的文学史,它以书面形式出现,包括各种体例,如分类合编体、作家纪传体、作品评论体、史话体、编年体、表解体、目录体,及运用西方文艺批评模式撰写的文学史,如进化史模式、精神史模式、接受史模式、形式主义模式、结构主义模式等。三是从书面文学史中凸现出来的理论构架,即如何建构一部文学史,它是蕴含在每一部文学史著作中的抽象观念,也表现在文学史家们日常关于文学史的言论与研究之中,这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无法回避的,不论他如何标榜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是如何的客观。上述三个层次可分别称为文学实践史,即客观存在的原生状态的文学发展史;文学史实践,也就是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工作;文学史理论,即文学史的内在关联性,是关于文学史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文学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文学实践史,更多的文章称为文学史本体,它自始至终客观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构成了另两个层次的基础。文学史理论是从文学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体现出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某种见解。文学史实践则是文学史家们在某种文学史理论指导下研究分析与描述文学实践史的过程。文学史形态学则是对已往文学史家们的文学史实践的理论总结,它研究文学史撰述的体式问题。

## 第一节 文学史



当我们说时间使文学史家的历史感成为可能时,我们无疑夸大了时间的效果,因为时间本身并不是历史感,历史感依赖于史家作为主体理解历史时所能感受到的深度,是历史理解的性质特征,而不是纯客体的时间范畴。这就使我们很可怀疑在史家的视野中审美的质素是否与共时阅读一样鲜亮,我们有理由将批评家拿起一本当代刊物时的心理状态与史学家在幽暗尘封的图书馆一角拣起一本发黄的小说时的心理状态区别开来,前者的身临其境的感受鲜度无疑是后者难以具备的,如果历史感是从发黄的书页中袅袅飘出的一种东西,那么,书页发黄的程度就代表了历史感的重量?这显然很滑稽,历史感必须是史家的感受的性质,它必须依赖时间流逝导致的距离感、陌生感,又必须建立在作家忘记这种距离之后以纯粹审美主体切入审美对象与之发生审美的心理共振的基础之上,也因此,它既是对时间距离特别重视的产物,又是抛弃了时间距离感的产物。过去,常识理论针对历史感的相对应概念是“历史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一般的看法是将对象放到历史时空中去把握,看它在过去的那一刻所起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相当诱人,因为它暗示文学史家抛开时空距离在冥想中回归文学史作品产生时的具体情境是可能的,史家可以像昔日的批评家一样玩味那些蒙上了历史灰尘的作品。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史家的这种回归到底是否可能?假如有一条时空隧道,人可以经其传输而去观望某个昔日,那或许还可能,可现实是人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刻,不能超前地活在未来,同样,也不能重返过去,如果重返过去仅仅是意识通过冥想而得到的结果,那作为意识冥想的功能必然是依赖于主体此刻的状态的,冥想的行为方式是此刻的,那些冥想的结果就必然带着“此刻”的烙印,在这里历史感同时也就是现实感,只有进入史家现实感的范畴之中历

史感才最终成为可能,就如加达默尔所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及历史理解的实在。”(《真理与方法》)历史感是历史理解的属性,它一方面是一种异己感,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亲和感。

现代阐释学肇始者施莱尔马赫认为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后来的相对于原来的作品具有一种基本的优越性,因而可以说成是一种完善的理解,这种完善的理解是因为后来的意识把自身置于与原作者同样的位置上(笔者认为这种位置的置换依然有着现时处境的基础),这里时间距离便成了主体意识可以加以克服的东西。而加达默尔则认为后来的理解的有效性正是因为它描述了解释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一种不可消除的差异,这种差异由他们之间的历史距离所造成,质而言之,在加达默尔看来历史距离不但不是必须克服的,相反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由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文学史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其一是,只有它在成为一种陌生物,对后来的意识(史家)来说充满异己感之时才成为可能,这时历史距离被看成是文学史得以成为历史的前提,居于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性格只有当它脱离了那种由当时环境而产生的现实性时才显现出来,它与充实着当代的各种意见的距离成为历史理解的真正积极的条件。第二种情况则被认识得完全相反,认为只是后来的意识重构了历史文本存在的环境,换言之,现实的客观要求提出了与历史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使之在当代意义上成为新的问题被提出,历史才有可能进入当代视野,而此时历史是以当代史的一部分的面目出现的,这时历史距离被认为是有害的东西,时间成为历史的可有可无的因素,因为这种历史的成形以共时性理解为规约。

## 二

一件古典文学作品、一本现代期刊摆在我们面前,显然它们不只是过去的,因为它们明明存在着,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称它们是“历史的”呢?不是由于它们乃是考古学或方志学的对象,也不是因为看上去那

些纸页发黄了、憔悴了。在一件古典文学作品和一本现代期刊中究竟什么“过去了”，是那个使其诞生并产生影响的背景过去了，如果在那个背景中这一文学作品具有直接的实现性，那么在新背景中，面对文学史家它们又一次成为对象则可以名之为间接实现性。“历史”正源于这两种实现性之间，也因此历史是一种“时间性”，它标示了文学作品两次实现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直接的物理的“时间”，后者标志的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延绵特性，不以主体的感知为转移，而前者则相反，只有在文学作品的间接实现性完成时它才成为可能。

这样，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过去的”是什么，以及它与“时间性”的关系，但意识到一个事物的存在并不特别重要，我们还必须将之感受为问题，那就是“过去的是如何过去的”，“它又如何使历史成为可能”？

我们已经大致接触了时间性与时间的差别，如果仅仅从后者来理解“过去”，我们的问题就被简单化了，物理时间的表象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连续一维体，过去是已经实现的，将来是尚未实现的，而现在是正在实现的，也因此时间是实现性的不同层次，一种固定的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是已经过去的”意念在人类头脑中具有先验性，但是“过去的过去了”并不先验地天然地就是历史，历史不仅是直接实现性的产物，同时还是间接实现性的产物，只有当一个事物拥有了两种实现性时它才成为历史，这两种实现性，相对应于两种自然物理时间之中的“过去”（已经实现的）、“现在”（正在实现的）。使这两种“实现”统一起来，成为“历史”的实现性的则是“时间性”，时间只会使这两者割裂，而时间性则使之统一，历史便是站立在这时间性之上的一种风景。

上述认识似乎给我们一种印象，那就是历史只关涉两次实现，它们分别存在于过去与现在，无关于未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时间段，它只是把过去与将来之间分隔开却又使它们相互贴紧的一条线，它使过去与将来相邻，紧邻而不能合一，它在另一种意义上既是过去，又是将来，它未实现时是将来，而一旦实现便是过去，历史正是通过这种在现在中的“间接实现性”，而通达过去又通达未来。

间接实现性所依赖的基础是直接实现性在此刻的意义,这种“意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明显地关涉到未来,历史学家在“现在”关涉它,是因为考虑到在“将来”它再次“实现”的可能性,也因此,“历史”实际上是在强调已经发生过(直接实现)的事物在现在(间接实现)与将来(可能实现的)关联,这就是实现与可实现性,时间与时间性之间的区别所揭示给我们的“历史”的最本质的特征。

“历史”是过去实现的事物在现实中被考虑到将来仍有实现的可能而产生的关注方式,它关涉常识意义上的过去,因为它是已实现了的东西的再次呈现,更关涉未来,因为它是还可能实现的东西的现在的说明,而后一点更为本质。

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历史”是“实现性”带来的,事物本身无所谓过去、现在与将来,只有它的实现性有,实现性的“过去”、“现在”、“可能”加给事物以时间性,使它具有历史性质。

这就决定了“历史”应该以“实现性”为对象。没有实现性,事物便不存在,更不能进入历史学。那么何为实现性?实现性存在于事物中,或者就是事物本身,因为事物正是借实现性展开自身,使自己成为事物,任何事物在实现自身之前都不存在,明确点说并不是先存在一个事物,然后由其派生出实现性,实现性使事物与环境发生关系,使事物完成自己的使命对它物发生作用,可以说正是实现性使事物成为事物,但是反过来,也不是事先存在一个实现性,然后由事物来填实它,仿佛实现性是一个本源,事物依之产生,并非如此,实现性与事物同时共在合二而一又是一而二的。但是实现性是一个比“事物”更为超离而具有人文性的概念,在“历史”学里,使用实现性概念意味着历史学将关注事物本身的目光转到了关注事物的实现——也即从主体的意义上来,从而把事物本身的自然时间抛开,关注事物存在的绵延性与人的需要的关系——时间性。

由上述认识可知“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而是一种“实现性”,它体现的是有时间性的“事物”与“人”的关系,它是由“可能的实现性”召唤出来的,现实的实现性对过去的实现性的综合,体现的是现实实现性主体与过去的实现性的关系。

## 三

舍勒就历史问题有一个“变更的方向趋势”的说法,将历史变更看成是“尚可经历及作为未来付出的生命受到已经度过的生命及其影响的不断吞噬”。这样伴随着已经度过的每一段生命,“人实际上是在不断经历着尚要经历的生命空间日益狭小”,而已经经历的那部分却浩浩荡荡地扩大。由此,在我看来,历史理解是或者说首先是人关于自身生命缩短的理解,人必须理解这种“吞噬”。这里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一般社会史,而其实文学为人类保有的过去的生活要比任何历史典籍都要多得多。马克思评论巴尔扎克的有关论述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巴尔扎克为我们描绘的资本主义成长史要比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记述都要丰富。在文学作品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恢复昔日的琼楼玉宇,再现历史黑暗中的芳草鲜花,看到历史之镜中阳光在楼宇间跳荡,闻到芳草鲜花散发出悠悠的香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也因此文学史与其说是离开人的意识冥冥中高悬于时间之流中的一根绳索,倒不如说它是主体心灵需要的产物,是主体心灵对自身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的可能性。

换言之,文学史存在的另一个前提是主体的需要。只有被主体意识到的过去的文学事件且被确定为相对于此刻具有某种现实意义它才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不存在不被主体意识到的文学史。只有某种事件能被我们理解并被语言所描述,它才能进入历史意识,文学作品在被理解的地方存在,它在另一层意识其实便是被经验到。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种历史意识看成是对某个被给定的过去的对象的主观行为,历史意识是属于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存在,名副其实的文学史必须在理解——历史意识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理解的历史按其本性乃是一种当值的却是过去的事件,它在主体性之外尚有其另外的存在的基础。换言之,一方面不是史家反映历史,而是史家构建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不先验地存在于主体心中,而是立于客观世界的基石之上。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我以为,历史存在于主体对客观历史的不断构造的